

难忘贵州民大的寒暑岁月

■陈麟

1984年国庆节前，从三岔河上游的乌蒙山麓，步行15里山路，坐1块5角钱54公里的农公车到县城，再从县城坐4块8角钱154公里的客车到省城，延安西路与山林路、枣山路之间的客运站广场上，迎新标语和迎新的人在那里等候新同学来报到，系学生会主席陈忠师兄张罗安排，周丽玲师姐带着大家坐上去学校的车，17公里到达董家堰山上的学生宿舍区，正是傍晚时分，6个人的宿舍，选了一个靠门的上铺，这就上了大学。

我原本没想过要上大学，小时候虽然喜欢读书，也说不清是为了逃避劳动还是追求上进，也没什么直接的目标，工作嘛，能做代课教师或开个手扶拖拉机已经让人羡慕了。高考填志愿，兰州大学新闻系、北京大学古典文学专业，是因为有空格才填进去；省属高校，填报了贵大、师院、民院，翻来覆去算分数，还是觉得不太踏实，最后填了几个地区办的财校以增加保险。只要能解决“户口”和“购粮本”，大学中专都行。其间，跟师院也签了定向录取合同，还是民院先走程序，录取到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。

进校的第二日，跟着一帮新生在学生食堂与体育场之间的空地上，等



更名前的贵州民族学院大门。

候送学院代表去省政府礼堂参加表彰会的大客车，带队的干部主任王桂森老师借机给大家介绍贵州民院校史。1951年创办，1959年撤销，1974年在龙洞堡社会主义学院复校，1977年恢复高考、开始招生，前几届在龙洞堡，后来选址到花溪董家堰山上，80级、81级、82级陆续搬到新址，先在花溪大桥旁的牛毛毡房过渡，直到1983年新生入学，才离开牛毛毡房。民院规划占地面积1300多亩，东临花溪

河、北靠职业院、西沿贵昆铁路西站与石板镇站一线、南接花溪水泥厂和东西向的花溪大桥铁路桥，与贵大、农学院在一条线上。王老师刚介绍完，车来了，我跟着大家上车，心里一直在想1300亩究竟有多大！

正式开学后，到教师宿舍和办公区领书，在学生宿舍和教室区上课，才知道南北距离超过3公里，东西距离超过两公里，中间还插了一块铁二局一处的办公区，确实够大的了。

1985年夏天，在贵阳当兵的几个老乡来看大家，在干训部老乡周成勤老师住处就餐，饭还没吃完，其中一个老乡说有事先离开，只听得下楼发动三轮摩托走了。过一会大家吃了饭，下楼到体育场大门边买西瓜吃，只见有个人骑着摩托车一趟跑过去，一趟跑过来，绕着体育场和学生宿舍转圈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之前先走的卜大哥，他说民院太大了，半天都转不出去，估计喝了两杯，找不着方向了。

早先，对大学的印象是遥远的，模糊的，对大学老师也是！但是经过4年的大学生活，锁刻在脑海的记忆时间愈久、印象愈深！

李华年老师是中文系主任，讲授先秦文学、古代文学，他上课先清嗓子，语速不紧不慢，一字一顿，虽然不苟言笑，但回顾讲课内容时，联想到一些表情，仍然可以记起来。他的板书很规整，左边写讲课大纲，不擦，右边画图、写字讲例子，讲完擦掉，讲完一堂课，提纲基本写满黑板，即使笔记赶不上，也可以对照补充。

潘定智老师是中文系副主任，1985年后中文系创办民族班，再后

来组建民族语系，任主任，讲授民族民间文学概论、神话概论。潘老师讲课，先讲故事，再梳理故事母题、传播区域、民族、国别，再讲价值、意义，由浅入深，由形象到抽象，娓娓道来，冲淡平和，让人印象深刻。

曲沐老师后来任中文系主任，讲授红学、宗教文学(佛经故事)，曲老师受柳永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的影响，北师大毕业后，辗转京广、湛江、都匀到贵州工作的，虽然所遇并不完全如江南诗意，但他孜孜于学术，深耕红学，把我们引入丰富繁复的人物世界。

王成杰老师是中文系总支书

记，讲授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、版本目录学。王老师是先参加革命工作后再去川大读大学的，因此总会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，特别是讲汉大赋、讲魏晋风骨，把经济社会与文学的关系梳理得清楚明白。

曾老师，有三个。一个是班主任曾垂提，讲授马列文论，一个是曾庆富老师讲授文学概论，还有一个曾祥麟老师讲授宋元文学。一个讲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，一个讲文学的起源，一个讲苏轼得鱼忘筌、得意忘形。三个都喜诘问，工作后才想到问题的好处一一至少不至于那么木讷！

还有讲授语言学的徐尚聪老师，上莎士比亚的徐东伦老师，讲巴尔扎克的邓世隆老师，讲语言可对比中俄英日，也可讲八大方言，语系语支条分缕析；讲莎剧背诵《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》《雅典的泰门》《李尔王》声情并茂；讲巴尔扎克不用讲稿，闭着眼睛可以一口气一堂课。

谢会昌老师讲授现代文学、比较文学，肖红老师、孟维佳老师讲授当代文学。从鲁郭茅巴老曹到繁花绽放的新时期，训练了我们比较的眼光和开放的思维。

顾补光老师讲授中共党史，蔡志君、沈昭华、张新志老师讲授政治经济学，马贤伦老师讲授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，赵亚林老师讲授哲学、陈秋平老师讲授逻辑学、王鸿文老师讲授教育学。顾老师是作

家，赵亚林老师学的是外语，蔡老师因去美国访学、由其先生沈老师代课，后来张老师由六盘水调来接手政治经济学课程。

进大学是幸运的，有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大学更是幸运的，人人朝气蓬勃、处处蒸蒸日上、举目英才荟萃；一些省内高校下放老师回城，调入民院；一些省外高校下放到贵州的老师平反后一时难以回去，也是以民院作为中转站过渡。除了本系老师，其他系的老师上课也可以去听。政治系赵森林、吴斯清老师，历史系侯绍庄、翁家烈、史继忠老师，数学系谭鑫、林敬藩老师，法律系的刘胜康老师，经营系的曹鹏老师，干训部的杨昌儒老师、预科部的安尚育老师、物理系的余重文、倪绍勇老师，中文系除前述，写作徐成森、秦敏、郝银生、钟旭老师，古汉语罗兰、金宗溶老师，训诂学王健、胡运超老师，唐代文学钟德恒老师，明清文学金宗冷老师，现代汉语陈泽霖老师，在高校中都是排得上号的人物。那时民院学术风气浓厚，校际交流频繁，即使在初创期简陋教室中，可以听数学家陈景润讲张广厚杨乐的课，也可听作家特·达木林、伍略、苏晓星老师的讲座；可以听法国第三大学哲学家熊秉明的交流，也可睹日本文化学者坪井洋文来访；既可请中央民院的陶立璠来讲新兴民俗学，也可请云南大学李子贤来讲高黎贡山田野作业。



上世纪80年代毕业照。

田野作业、社会调查，是民院的一项特殊课，也是特色课。每逢寒暑假，都要明确一些方向或专题，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。

1985年夏天，大一下学期快放暑假的时候，我在宿舍楼前边看到一张海报，征集侗族民间文学调查爱好者，在暑假参加社会调查。我想老家也有侗族，何不趁假期跑一跑，搜集整理些材料上来。顺着海报留下的联系地址，我从学生宿舍步行两公里到教师宿舍，找到课题负责人罗懿群老师，罗老师很热情，又是泡茶、又是问名、又是问家庭情况，一下子打消了我的陌生感。他给了我一个提纲，一些参考资料，包括贵州侗族分布情况，当地县民委负责侗族调查的联系人，不厌其烦回答我的一些天真

的问题，整整呆了一个下午，才离开罗老师家返回宿舍。

调查提纲所列科目非常详细，包括家庭人口、村落人口、主要姓氏及来源、聚居与杂居方式、生产工具、生活资料、种植业养殖业、田土比例、商业贸易、收入来源，包括上学人数、小学、中学、技校、大学在读和毕业人数，日常交流语言、使用的文字，若使用少数民族语言，主要词汇要记录、并用国际音标标注，民族民间神话、故事、歌谣若能录音，尽量录下来，并注明传承人姓名、年龄、性别、传

承方式等，涵盖了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各方面的内容。对于我这个大一学生来说，任务比较庞杂甚至有些科目理解不透，更不要说调查了。尽管有困难，但活儿是自己主动上门领来的，只能硬着头皮干啦。那个暑假，我花了近海报，征集侗族民间文学调查爱好者，在暑假参加社会调查。我想老家也有侗族，何不趁假期跑一跑，搜集整理些材料上来。顺着海报留下的联系地址，我从学生宿舍步行两公里到教师宿舍，找到课题负责人罗懿群老师，罗老师很热情，又是泡茶、又是问名、又是问家庭情况，一下子打消了我的陌生感。他给了我一个提纲，一些参考资料，包括贵州侗族分布情况，当地县民委负责侗族调查的联系人，不厌其烦回答我的一些天真的问题，整整呆了一个下午，才离开罗老师家返回宿舍。

第一次调查尝到甜头，后面两个暑假也就停不下来了。

1986年夏天，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社组织“三套集成(民间故事、民间歌谣、民间谚语)”调查队，赴镇宁自治县调查，研究社社长、民语系主任潘定智老师、副院长、院团委书记宗林老师、秘书长杨正伟老师委托我承担一些事务。潘老师带着我去省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申请了经费，解决了为期两周的食宿补贴。放假第二天，调查队开赴镇宁，先去扁担山黄果树采风，增加实感，然后在县招待所进行为期两天的培训，县委副书记马启忠出面调度，每个组加一个当地人，以区为单位分下去，我带一个组负责城关区锦屏、包包上、阿岔大寨。这次调查，因为有统筹

指导和地方支持，顺利完成了任务，两年之后镇宁自治县出了一本全集。

大学的第三个暑假，社会实践活动由院团委和民研社组织到花溪区调查，经费由学校拨付，罗懿群老师协调花溪区提供部分支持，整理资料，由宗林、杨正伟两位老师把关。我除了配合院团委工作，也带一个组到高坡的沙坪甲店、黔陶赵司骑龙等地进行调查，主要任务还是花溪版的“三套集成”，1990年花溪文联出了两册。第一个暑假，不知搜集也不知整理，第二个暑假，知道搜集不管整理，



20世纪80年代初，建设中的花溪校区(临时教室与宿舍)。



《宝存金石气，室有蕙兰香》
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张达 书



《风筝》

■六盘水钟山区第七小学六(6)班 魏雨婷

鱼香如故

■安龙县第一中学高一(3)班 韦浩然

我家住在布依村寨的河边。村里人大多打鱼、种地。我家邻居，他儿子叫“包”，我们都叫他包爷。

包爷家靠打鱼过日子。从我记事起，他家门口就总晾着渔网。我们两家挨得很紧，房子中间连条巷子都没有，顶上是一个大露台。我可以随时从我家楼梯上到他家楼顶，再推开那扇从锁的门，就进了包爷家。

包爷那头发，乱糟糟的，脸上皱纹一摞一摞。见了，他就笑，不管什么时候都会跟我打招呼、说上几句。他有个小儿子叫管哥，比我大好几岁，是我小时候的玩伴。我们整天在他家跑来跑去，跳上跳下。包爷看见了，顶多说一句，“小心哦！”

有一回，管哥把我玩具车上坏掉的马达拆下来，蒙上木片，搁在一块泡沫板上，放进水里——那船跑得比真渔船还快。我简直崇拜他了，天天跟他黏在一起。他不在的时候，我就一个人窝在他家客厅看CCTV-6。包爷想换台，见我不动，也不吃声，就悄悄坐到我旁边。

一次电视上放两只大科莫多龙在打架。贵州可没见过这么大的壁虎，包爷吓了一跳，指着屏幕用布依话说，“那是什么？”我用不标准的布依语试着说“科莫多龙”，说不利索，又换成普通话。他也跟着学，说得别扭。我忽然来了劲，吹了一句只有小孩子才信的大话——用布依话一字一顿地说，“我爸跟它在山上打过架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嗯！我爸一个人把它们两个都打跑了！”

后来春节去他家吃饭，他居然跟我聊起这事，“小然说你在山上遇到两只……科……科莫多龙？”我瞪了我一眼，我只好理头数鱼肚子上的刺。

每年春节回老家，桌上总有一盘包爷家端来的红烧鱼。年年有，味道也不变。可吃久了，我就有点烦了。后来几年，我总找借口不去他家吃，说自己想吃零食。我妈连零食包装都不让我碰。等我们吃完饭，我从包爷家门前路过，头都抬不起来。可每次都能听见他说，“没胃口啊？那下次再来吃。”

后来，管哥出门打工了。他偶尔回来，也不怎么跟我玩了。他开始挣钱养家，我只需要读书。两人好像没话了。以前包爷晚饭后到河边走走，后来他不爱出门了，就在家喝酒——酒瓶一天比一天多。他常常喝得烂醉，半夜里骂骂咧咧，跟老婆吵架，有一回差点动起手来。

我慢慢地就不怎么去他家了。他家的鱼香，也很久没闻到过。

那天我又用“吃饱了”推掉他家的鱼。很晚了，我听见他家传来一阵骂声，还有哗啦啦的声音。我怕他喝醉了又打老婆，赶紧打电话给我妈。过了好一阵，我妈回过来，“包爷喝醉了，在骂鸡呢。”

我脑子里一下子冒出他的样子——满头白发，脸红彤彤的，对着几只鸡拍着腿臭骂，还折了根树枝要教训它们。我笑了一下，又不笑了。对着夜里想了很久，我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

后来再回老家，我又坐到包爷旁边吃鱼。他笑着夹了一块给我，还是鱼肚子那块没刺的肉，“前几天刚捕的，多吃点。”

我低下头，想说句对不起，嘴张了张，又闭上了。

又快过春节了。我想包爷了。想河边那股子烟火气，也想那盘年年都是一个味儿的红烧鱼。

指导老师：王云